

活页文史丛刊

1-30

淮阴市志编印

2027
187
828152

· 中国史专题 ·

淮 阴 师 专
编 辑 出 版

淮阴文史丛刊



20134198

周总理青年时代关于淮阴的札记(三则)

飞 飞 漫 墨

周 恩 来

有咏岳少保祠者，其七律一首*云：

“一自金牌颁十二，常教血泪洒英雄。

奇冤不恨埋三字，和虏终惭失两官。

南渡江山悲逝水，北征鞍马付秋风，

低徊往事成千古，祠宇空余夕照红。”

其辞则凄凉欲泪，意则新颖出群，不落窠臼，少陵、太白，殆兼而有之。

(《敬业》第四期，一九一六年四月出版)

*此诗系周恩来同志少年游淮阴东岳庙时所见，录之并加评论。

二

江苏淮安中学学生，出版一杂志，名曰《学生》。其文苑中有咏淮阴侯钓鱼台诗颇伙，今记其一，云：

“漫言官锦傲渔蓑，渔舍侯门两若何。

果使功成返渔钓，君臣今古白头多。”

四句一气呵成，次韵尤具出群之概，超超元著，怀古诗至斯，良足贵矣。又记有一韵云：“谁知一掷渔竿后，忽地淮阴有伟人。”其气壮矣，然较之前者，不啻上下床之别。

（《敬业》第四期，一九一六年四月出版）

三

郝君之御，字梦侯，直隶北平人，淮安旧令郝公少山孙也。肄业吴城师范学校，与余戚曾景参先生同窗。先生为余述君性慷慨勇为，敏慧绝伦，于科学具理化之长，每试未尝作临阵之举，于课程如老衲伏案者殆未曾见。然其结果恒不恶，岂其得天独厚欤？所作诗词尤伙，著有《情天空》说部，盖纪实也。君与吴城某女士为书中之主人，女士与君善，发乎至情，终乎礼义。于是闺中少女，帘外书生，课余之暇，既多见面之时，更结同心之侣。执经雪夜、问字花朝，此正如阴阳电气，相感无形，磁铁性情，自能联合者矣。然而天下事失意者恒来八九，情根早种，便非幸福。一则罗敷有夫，一则使君有妇，空盟白首，箫玉之聚无缘，误系红丝，桃李之僵安代，命何薄耶！福何浅耶！未免有情，孰能遣此？呜呼！前尘影事如春梦，鸿雪因缘付水流，此《情天

空》之所以作也。然又安有伤心人为之痛哭流涕，向扬子江头虎邱山畔诉不平哉！君性既勇为，遇不平事辄奋身为剖曲直，务得其平而后已。嗣以事出师范入工业染织科，三年业成。以无大力为之游扬，仅执小学主任，龙蟠大陆，固未足展君怀抱，此尽魍魉，奚能让君露头角哉！先是君家道式微，负笈需资即多拮据，赖景参先生与二三至友时接济之，始完厥业。至是徒嗟困顿，满腹牢骚，伤情天之尽幻，恨斯人之不遇。吾知君之悲恨滋多，而绝妙好词想亦与旧恨新仇俱积也。且君于人则奋身就义，惟恐谋之不臧，于己则着着失败，所如多左，吾悲君之志、君之情，且悲君之拙于己而智于人也！

（《敬业》第四期，一九一六年四月出版）

关于沈泽民赴日学习的时间

程中原

（淮阴师专中文系）

茅盾回忆录《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上）》（《新文学史料》第四辑）生动地叙述了其弟沈泽民渴欲参加革命、赴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过，但在具体时间上却记忆有误。茅盾先生说，泽民离开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尾，赴日本后“在东京住了一年”，“又认识了当时在日本的田汉，由田汉介绍进了‘少年中国学

会’”。这里所说泽民入会时间和经过、赴日时间及在日居留时间均不够准确。

一、沈泽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时间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或再早一点，地点是在南京，并非由田汉介绍。因为继“少年中国学会”于一九一九年七月正式成立之后，它的南京分会也在十一月一日开了成立大会。当时南京分会有会员十一人，出席成立会的九人，其中即有沈泽民在内。（见《少年中国》一卷六期，1919.12.15）

二、沈泽民赴日学习是在一九二〇年七月。茅盾的回忆错后了一年。《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会务报告》第三节谈到，《少年世界》本“由张闻天、沈泽民两君担负校勘责任”，但因“张、沈二君将于今年七月赴日”，故改请别人担任。“今年”，即学会成立周年的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一年七月，沈、张早已回国，并一道到南京参加了一日至四日“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二次年会。

三、沈泽民在日本居留时间约为半年。一九二一年一、二月间，沈泽民同张闻天即一起从日本返回上海。这在《少年中国》二卷八期（1921.2.15）上有记载：“张闻天、沈泽民已由日返沪。”此后他们出席了三月二十七日在龙华开的成立上海分会的酝酿会（见《少年中国》二卷十期，1921.4.15）。随后，沈泽民“赴芜湖第五中学任算学教员”（《少年中国》二卷十一期，1921.5.15）。可见沈泽民在日本只住了半年左右，即从一九二〇年七月赴日本，到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十五日之间回上海。

·图书文献专题·

活页文史丛刊

淮阴师专
编辑出版

2

《资治通鉴补》题跋

汪辟疆 遗著

此书自清初至乾嘉间只传抄本，咸丰辛亥江夏童和豫始拟印百余部，流传已稀。光绪丙子毗陵盛康又校正付聚珍版拟印，即此本也。盛本印书尤少，今亦不易得。余于丙戌自蜀东还，丁亥六月乃托书贾姜某从苏常故家物色之，果于宜兴任氏得此佳帙，为之快慰。余向喜涑水书，尤酷爱胡梅磻注，于地理水道以及删取旧注最为矜慎不苟。严、谈二家所补有得有失，然补注附录要足以扩见闻，备翻检，读涑水书者殊为便利；钱竹汀极服严书，以为胡氏后一人。莫邵亭亦曾据稿本，录严补于胡刻书眉。今莫本尚存南京图书馆善本库中。是此书早为艺林所重矣！

方 湖 记

编者按：彭泽汪辟疆先生，历任南京各大学教授。对目录学、校雠学、文献学以及水经郦注、唐人小说、宋代文学，均有精湛研究，为国内外知名学者。毕生致力于教育与学术，门墙桃李，遍及海内。著述除已发表者外，存稿尚伙。又性喜藏书，嗜校雠，故群籍靡页书眉，字里行间，工楷批注，朱墨粲然。平生心力，流贯其间。倘能早加辑录，板行问世，则嘉惠来学，厥功匪鲜。

本文系南京大学汪樾同志抄惠，谨致谢忱。

伊尹或宫刑奴隶（《楚辞》待问录）

《天问》称伊尹小臣，为吉（姑）国王妃之媵奴（说详拙作《天问伊尹故事新解》之二，《求是学刊》1980年第1期）。陪嫁奴隶多去势，以免“秽乱宫闱”（《墨子·尚贤篇》亦称伊尹“女师仆”）。甲骨文五刑俱全，弇或读阉。伊尹曾被阉割，故《荀子·非相篇》云：“伊尹之状，面无须麋（眉）。”盖如太监，第二期体毛不发达。因而伊尹被汤派到夏桀处以后得以出入宫禁：“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御览》卷135引《竹书》）“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国语·齐语》）良有以也。

物題 專版
文專 師出
古米 陰輯
考芝 淮編

3

活頁文史叢刊

張旭年考

閻一多遺著

顏真卿《張長史十二意筆法意記》曰：「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尋年譜，事在「天寶五載」。蘇渙《贈零陵僧兼送謁徐廣州詩》云：「張顛沒在二十年，謂言草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后，新書大字大如斗。」又云：「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翰凌猷之，見君絕意必深知。」案亞相指徐浩。《新書·方鎮表》：「嶺南节度使，大历二年徐浩拜；三年迁吏部侍郎，李勉代。」《旧書·代宗紀》：「大历二年二月，以工部侍郎徐浩为廣州刺史、嶺南节度使；三年十月，以京兆尹李勉为廣州刺史、充嶺南节度使。是蘇渙此诗当作于大历二年二月至三年十月之間。假定为二年，由此上数二十年，则旭卒于天寶六載（七四七）。竇象《述書賦》叙并世書家似依年輩为次，而張旭在賀知章前。考知章生于显庆四年（六五九），假定旭長知章一岁，则生于显庆三年（六五八），以天寶六載卒計之，当享年九十。李白《草書歌行》曰「張顛老死不足數」，盖謂其以寿終也。

聞自強先生治唐詩史，專精厉意，前无古人，心仪久之。二十七年秋相遇于长沙旅次，适多方撰《全唐詩人生卒年考》，承命留書，即錄張旭年考一則，敬求指正，时倭寇肆虐，沪战大场失陷之翌日也。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text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ccurate records of all transactions, including sales, purchases, and expenses. It emphasizes the need for consistency and thoroughness in record-keeping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financial data.

2.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ext describes the various methods used to collect and analyze financial data. It mentions the use of surveys,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to gather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statistical techniques to analyze the data and identify trends and patterns.

3. The third part of the text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conducting financial research. It mentions the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accurate and reliable data, the potential for bias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and the need for careful interpretation of results.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ethical standards in financial research.

4. The fourth part of the tex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s of financial research in various fields. It mentions the use of financial research in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policy-making, and academic research.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research in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5. The fifth part of the text discusses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research. It mentions the potential for new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financial data.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ed research in financial research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

[illegible]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names and titles, including "The Hon. Mr. Justice" and "The Hon. Mr. Justice".

... ..

1944

... ..



... ..

... ..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五）臺灣省：1945年12月25日，日本投降後，臺灣省於1946年1月1日正式成立，首任省長為蔣中正。1946年4月，蔣中正親自主持了臺灣省政權的交接儀式，標誌著臺灣正式回歸祖國懷抱。隨後，蔣中正政府開始在臺灣推行各項建設，包括教育、經濟、社會等領域，為臺灣的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0-1951

1990

1944-1945

跋

闻一多先生《张旭年考》

孙 望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闻一多先生(1899—1946)，湖北浠水人。他是我国有名的诗人，对古典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又是一位以行动来实践其言论、抱负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

在诗创作的旅程上，闻先生曾是一位浪漫主义唯美派的诗人，这，可取《红烛》(1923)为代表。后来又成为“新月派”诗人之一。作为“新月派”诗人，在艺术技巧的追求和形式美的讲究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新月派”诗人之间，风格却各有不同。就如徐志摩，他是“新月派”中一直沿着脱离现实而走唯美道路的诗人，而闻一多先生则不同，他是逐渐转向了正视现实的道路。正视现实，不等于说他即刻找到了方向，但从《红烛》以后的诗作中，人们却可以看出他是在苦闷中竭力挣扎，一边诅咒罪恶的社会，一边又希冀探求到一线光明。《死水》(1928)便是闻先生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这和徐志摩、陈梦家等诗人的风格是绝不相同的。正因为闻先生能转而注目于现实，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四十年代的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这道理不是很明白的吗？

闻先生后来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我并不认为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钻故纸堆”。钻研古代文学，看来似乎有

“脱离现实”之嫌。然而，问题不能单从表面看，有不少人不是从古代文学遗产里接受了我国古诗人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传统吗？对闻先生来说，屈原的《楚辞》，不就给了他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吗？元结、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篇，不就给了他揭露黑暗现实的勇气吗？闻先生的在古代典籍中做工夫，应该和“国粹主义”或“读经派”学者们的钻故纸堆作严格的区别。

对于闻一多先生，我是一向钦佩的，曾跟他通过信。大约是1936年的事吧，那时我还在金陵大学读书，他是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主任。1937年，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八月底，我到了湖南长沙，在一个矿业（锑产品）机构里工作。当时清华大学也迁来长沙，在“圣经学院”落脚，改名为“临时大学”。秋末冬初之际，由朱自清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闻先生。

第一次见面是十月二十八日。我到“圣经学院”，朱先生说：“闻一多先生已经来长沙（朱先生比闻先生先到几天）了，我曾和他谈起你，他说很希望与你谈谈。”我非常高兴。朱先生住第三宿舍二楼七号，闻先生住楼下宿舍。朱先生立刻带我去看闻先生，介绍后，谈了一些忧心时局的话，朱先生便先自去了。于是我就和闻先生谈开了，他问起我的工作。我说：大学毕业后原想一辈子做个教书匠，以余暇的时间研究研究唐代的文史，谁料到一毕业就碰上抗日战争，避难来到长沙，现在干的是锑品生产量统计与出口报关的工作，成天和“生锑”、“纯锑”、“锑氧”的吨数打交道，混口饭吃吃而已，深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而在精神上感到苦闷。闻先生劝我不要那么想，说：“成天躺在学问里

的人，未必一定作得出真正有价值的成绩来，有时反不如做着不相干的工作，以余力从事某一门学问的人收获来得大。”我知道，这是闻先生对一个苦闷的青年的安慰，也是他自己谦虚态度的表白。接着，便谈到唐诗的问题，他告诉我正在从事《唐诗人登第年代考》和《唐诗人生卒年考》的撰著。说着说着，便从书堆里搬出原稿来（订成大开本的原稿）给我看。他翻了好几个诗人的生卒年考，告诉我作出那些结论的依据，最后翻到了张旭这一条，他兴奋地说：“根据颜真卿、苏涣、窦阜的诗文以及《新唐书·方镇表》、《旧唐书·代宗纪》等资料，可以得出生显庆三年（658）、卒天宝六载（747）的结论。”接着交谈了彼此所想做的工作。我说，我想做一个唐代人物的综合索引。闻先生非常赞赏，说他也愿意做这项工作。闻先生接着又告诉我，他想就《全唐诗》来考订各家诗作的错出与真伪问题。我说，这个工作我也感兴趣，可惜的是，我底子太薄，不敢多作奢想，目前，两手空空，也没有条件。谈呀谈呀，觉得彼此欲从事的工作，大致相同，不禁相顾而笑。虽说是初次会面，使我意想不到的，这么一位有学问的教授，对我却一见如故，把我当作一个熟朋友一样看待，热情，诚挚，坦率，真可谓是“忘年而下交”了，虽然我没有以孔融来自比的资格。忽然有人扣门，走进来的是沈从文先生。闻先生给我介绍了，要我再坐一会，我怕妨碍了他们的正经事，所以不想再久耽了。闻先生送我出门时，约我明晚再去谈谈。他说临时大学不久要迁衡山，以后还要迁，再要见面就很难了。我顺便请他把那一条张旭生卒年考写给我留作纪念，他欣然应承。这样便结束了初次会面。

第二次会面就是次日，即十月二十九日。晚饭后，我又去圣经学院，见到了闻先生。略谈刻多钟，他要去吃晚饭，留我在房间里稍待一会。不多久，他便回来了。话头便转到了唐人年谱上，闻先生很希望有更多一些朋友一同来做唐人年谱的工作。于是把彼此所知道的已有的唐人年谱开列成目。他还给我介绍了李嘉言先生，说李先生也有同样的想法与爱好。他说：“将来可以挑选一些重要的但还没有人做过年谱的诗人，大家有计划地来分担这项工作。”谈呀谈呀，夜已深了，我怕过久的打扰他，影响他睡眠，便起身告辞了。他顺手把已经写就了的这条张旭生卒年考递给了我。这，正好是沪战大场失守的第二天。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闻先生是1942年的春天。那时他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我因事从重庆去昆明，是霍焕明（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是闻先生的学生）陪我一同去拜访他的。交谈的具体内容已记忆不起，只有一个印象却十分深刻，那就是闻先生已留上了一大把山羊胡须，抽着烟斗，我蓦一见面，已全不认识，待到定睛细看，才辨认出来。然而他精神抖擞，使我感到与那一大把山羊胡须全不相称。那时我满以为一旦抗战胜利结束，便可以找机会多多向闻先生请教，但做梦也没想到他却在1946年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时期为了争取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而流血牺牲于特务之手，顿使人民失去了一位最勇敢的民主战士，使文学界失去了一位诗人，使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卓有成就的专家，也使我失去了一位我所崇敬的良师。

以上也许是多余的话，但为了要说明这条张旭生卒年考的来历，也就不得不扯到我与闻先生交往的始末。顺便要说

明的是：对于1938年那一段交往所以叙述得比较详细，这还得感谢那几年的日记，没有被“造反派”没收去，所以主要是依据日记所记来叙述的。至于1942年前后的日记，不幸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革命派”革掉了。我老矣，记忆力可悲地日益衰退，失去了文字记录，我已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对我自己来说，真是一件“甚为遗憾”的事。

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篇“跋”，我不知道这些多余的话能不能算“跋”？我想，即使能算“跋”，也应该是一篇不合体制、不合规范的“跋”。好在写出来，让我借此对我所敬仰的闻一多先生表示我一点纪念他的诚意，这总是可以的罢！

关于民俗学的信

孙作云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

……（以民俗解《楚辞》）这一行业是不容易的，本身极难，若没有一定的聪明、功力，是办不到的。——死脑筋，读死书，不知联系，是永远办不到的。但若太活了也不行，容易跑野马。唯一的办法，正如先生所言，能通古文字，能读古书，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批判，能联系民俗学，还得懂得点文学（真正懂得文学），然后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否则，将一辈子弄不出一点名堂来。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

翠矦与夷羿（《楚辞》待问录）

窃疑《东君》翾飞之翠曾可读为翠矦，盖翠饰之箭缴，以应律合节而会舞也。东君有翠矦，其分身、准日神兼射神之后羿亦有天所赐之“彤弓素矦”，而北大中文系《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1978年版）注为：“红色的弓，带有白色羽毛的箭。”此盖误读《广雅·释器》“矦箭也”而讹。案王疏引《说文》卷五矢部：“矦，雉射矢也。”《周礼·司弓矢》：“矦矢，用诸弋射。”郑注：“结缴于矢谓之矦。……可以弋飞鸟。”《史记·留侯世家》索隐引马融注：“缴系短矢谓之矦。”《文选·西京赋》薛综注：“缴射矢长八寸，其丝名矦。”并可证矦为系箭之缴。而《国语·吴语》有白羽、朱羽、乌羽之矦。韦注：“矦，矢名，以白羽为卫。”此借义，且未谓各色羽括之箭必无矦缴。

案：我国弋射之矦矢起源颇早，图象虽仅见于战国铜器及汉画，甲金文吊、叔、弟、夷诸字皆象有缴矦箭矢之形，盖初民用绳系箭以便回收箭矢，且利缠绕、检获飞禽也。羿字从羽，与鸟翼、箭羽利用风力飞翔有关。羿，偃（燕）姓，属东方夷人鸟图腾集群（参见拙作《甲骨文四方风名新解》）；夷羿声近，夷者《说文》训东方之人，而甲金文皆作有矦缴箭矢之状，殆因纪念夷人及其文化英雄后羿或夷牟发明矦矢而制字、得名。此所以《墨子·非儒》《吕览·勿躬》皆谓夷羿作弓，而《世本》《说文》咸称夷牟作矢也。

（萧 兵）

·现代文学专题·

现代文学丛刊

淮阴师专
编辑出版

4

《关于瞿秋白……》的通信

丁景唐

(上海文艺出版社)

第一信

上海——淮阴

郑乃臧、唐再兴、杨杰同志：

七月中旬，我随北京来的几位同志从上海到了瞿秋白同志的家乡——常州，以后，又从常州到了南京。我在招待所里，初次看到了你们的《关于瞿秋白……》〔1〕一文。你们为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推倒林彪、“四人帮”横加给秋白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但，当时我看到的还是刚从出版社取来的样书。

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和杨之华同志以及一些研究秋白同志作品的研究工作者一起，由于遵循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写过一些学习秋白同志作品的文章。在秋白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帮”鞭尸挞

伐之际，也受到株连，受到批斗，受到所谓“讨瞿”英雄们的污蔑和攻击。说实话，我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之中，是被剥夺了看那些所谓《讨瞿战报》一类东西的权利的。我弄不清他们究竟批了一些什么“黑论点”，提出过一些什么“豪言壮语”。我回到上海以后，好容易才由有关同志替我找来一、二本早已随风而逝的所谓“讨瞿”书刊。随便翻翻，也算增加了一点知识，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些苍蝇般营营乱叫的东西。

以后，南京的友人寄来了《钟山》文艺丛刊，我才又一次读了你们的文章。经过你们的分析批判，比较清楚地知道了有关的“论点”。你们根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确凿的历史事实批判了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下的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论点”，为肃清流毒、影响，还秋白同志以本来面目起到了拨乱反正的良好作用。

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十年大灾难、大浩劫，恶果十分严重。现在的青年一代（包括中文系的一部分大学生）竟不知秋白同志的革命史迹、他与鲁迅的永彪史册的革命友谊、秋白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这方面，我们既要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要做很多普及工作，介绍和研究工作。许多事情在我们认为是普通常识，但对青年却是启蒙教育。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对于你们的文章，我谈两点看法，供你们参考。

第一，关于鲁迅和秋白当时批判和斗争的对象问题，我认为，最好把对国民党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敌我矛盾的斗争，与对“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思想批判，区分